

尹业初 著

胡寅历史政治哲学研究

——以《致堂读史管见》为中心

The Research o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u Yin:

“Zhi Tang's Hubtle Views Through Interpretating History”
be as 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胡寅历史政治哲学研究

——以《致堂读史管见》为中心

尹业初 著

The Research o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u Yin:

“Zhi Tang's Hubtle Views Through Interpretating History”
be as 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寅历史政治哲学研究：以《致堂读史管见》为中心 / 尹业初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2
ISBN 978 - 7 - 5161 - 3982 - 0

I. ①胡… II. ①尹… III. ①胡寅(1098 ~ 1156 年)
—政治哲学—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244.9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691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凌金良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王娅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90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胡寅生平事迹简介	(8)
一 生平事迹	(8)
二 著作及其版本流传	(14)
第二节 《致堂读史管见》史论因由	(16)
一 胡寅家学渊源	(16)
二 时势逼迫	(25)
第三节 《致堂读史管见》题解	(30)
 第一章 史论之基本特征	(33)
第一节 论评史料的取舍	(34)
一 树忠良、斥篡贼	(35)
二 明仁义、隆儒术	(39)
三 立三纲、兴教化	(45)
第二节 史论褒贬的标准	(51)
一 义理标准	(52)
二 正统标准	(56)
第三节 突出经史之别	(65)
一 凭经断史与以史证经	(66)
二 经权之道	(73)
 第二章 史论之本体意识与崇正之辨	(81)
第一节 宇宙本体论	(81)

2 胡寅历史政治哲学研究

一 天理论	(82)
二 阴阳气化论	(86)
第二节 崇正之辩	(93)
一 辟佛	(94)
二 辟道玄	(101)
三 华夷之辨	(107)
四 崇儒之正	(114)
 第三章 社会历史的追溯与展开	(121)
第一节 历史演变的根据	(122)
一 由天命至圣人	(122)
二 由天命而天理	(129)
三 民生为本	(133)
第二节 历史演变的依归	(139)
一 “三代”理想社会之情结	(141)
二 封建制与井田制	(146)
三 法《春秋》之义	(153)
 第四章 政治思想的批判与构建	(163)
第一节 基本政治理念	(163)
一 王道至上	(164)
二 仁义为体、礼制为用	(170)
第二节 政治制度批判	(171)
一 批法家之刑政	(172)
二 批王安石新政	(178)
第三节 理想制度思考与构建	(186)
一 人君之道	(187)
二 宰相之制	(193)
三 道德之教与刑法之设	(198)
四 人才之用与官职之分	(203)

第五章 经世致用之历史影响	(210)
第一节 对“国是”的影响	(210)
一 君子小人之辨	(211)
二 朋党之争的延续	(217)
三 对南宋政治进程的影响	(221)
第二节 对治学的影响	(226)
一 先经后史的治学方法论	(227)
二 劝善惩恶的治学修养论	(230)
三 崇儒正道的治学目的论	(233)
第六章 对史论之比较反思	(238)
第一节 对史论之比较	(239)
一 胡寅与司马光史论之比较	(239)
二 胡寅与朱熹史论之比较	(249)
第二节 对胡寅史论之反思	(261)
一 定性反思	(262)
二 地位与历史作用反思	(266)
参考文献	(272)
后 记	(286)

绪 论

儒家历史政治哲学蕴含在史论之中，其史论传承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孔子虽自称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①。但孔子在述的过程中并非不作，在语录形式的《论语》中，即渗透着孔子的历史政治意识，他在删定《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的过程中，也涉及对历史事实的主观选择，隐含对历史事实的价值评价。子思指出，“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②。这表明儒家学派的形成其实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这个历史渊源存在于孔子之前，凝聚结晶于经过孔子删定而成的六经之中。明代王阳明对儒家经典曾论述道：“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③ 王阳明“《春秋》亦经，五经亦史”的观点，揭示出儒家经史相融相通的特点。清代学者章学诚则指出：“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④ 由此可见，孔子在经书中对远古历史的记载蕴含了他的精辟论述，暗含了他对历史政治的见解与主张，可以视为儒家史论的开端，总体上奠定了后来儒家纵论古今的思想基调。

秦以武力统一天下，推行郡县制，取代封建制，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崇尚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理念，从而使坚守先王之道、遵循圣人之义的儒家遭受重大打击。西汉虽承秦制，但从根本上改变了对

① 《论语·学而》。

② 《礼记·中庸》。

③ 王阳明：《传习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④ 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儒家轻视的态度，汉代统治者需要从儒家思想中汲取营养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长治久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是这种政治理念的典型表现。秦亡汉兴的历史事实，激起了西汉初年儒家学者对秦二世即亡原因的积极探讨。陆贾在其《新语》十二篇中，就向汉高祖刘邦提出天下应当“逆取顺受”的建议，即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这可以说是首开西汉儒家学者对历史事件进行评论的先河。后来更有贾谊的《过秦论》系统而深入地分析了秦亡原因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用儒家仁政德治思想指导来论评历史，成为儒家史论中不朽的名篇。两汉时期，史学兴盛，其中代表性著作《史记》《汉书》中，穿插了一些历史评论，这些史论的基本精神也贯穿着儒家的历史政治理念。

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汉代大儒董仲舒就是专治《春秋》的经学大师，其对孔子所传承的春秋公羊学进行了系统的阐发，形成了完整的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理念的一整套儒家理论，全面地阐释了尧、舜、禹及夏、商、周的社会政治历史发展，为汉代提供了急需的政治意识形态。春秋公羊学，及其以后兴起的春秋谷梁学、春秋左氏学共同构成了传统儒学的史学文化传统，对后世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般而言，儒家思想在治世与盛世时期，可以发挥修齐治平的作用；在乱世与衰世时期，可以发挥明道淑世的作用。儒家常常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①，这种精神自古以来感天动地，历久弥新。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礼崩乐坏，动荡不安。这个时期的儒家在思想层面与社会领域便隐而不彰，被迫退出了主导地位，但在现实中仍然维护着社会政治的稳定，指引着那些茫然不知所措的精神生命。反映在史学领域，即纂修正史的传统已经逐步形成，《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等史书中的史论，有许多反映了积极入世的儒家学者针对现实社会制度的弊病发出的警示，如陆机“以孙氏在吴，而祖父世为将相，有大勋于江表，深慨孙皓举而弃之，乃论权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遂作《辩亡论》二篇”^②。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

① 《论语·宪问》。

② 《晋书·陆机传》。

史论在当时也并非乏善可陈。同时,有些学者对儒家的史论从文献或者体裁上做过一番梳理。如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中的《史传》,萧统所著《昭明文选》中的《史论》,都是比较好的代表作品。

隋唐时期,历史轨迹与秦汉时期表现出相似之处,唐朝也是建立在隋朝短命王朝的基础之上。因此之故,唐初儒家的史论大都围绕着后世统治者应该怎样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避免重蹈覆辙而展开。唐朝实行比较宽松的文化政策,儒、释、道三教成鼎足之势,但“安史之乱”的爆发,使社会急剧凋敝,思想出现混乱,儒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韩愈主张“文以载道”,对儒家的道统进行了阐释,并以延续儒家道统为己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宋代儒家史论的风格,史论特色发生转变:汉代以来,儒家史论注重论评外在社会制度;唐宋以后,儒家注重论评帝王将相的心性道德。唐代还出现了专门评论史书的著作,如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史通》有内篇与外篇之分。内篇以论评史书的体例、史料的采集、概述史书的要点为主;外篇则以论评史官的设置、史籍的源流、史家的得失为主,体例完整,线索清晰,有很高的学术思想价值。但到五代十国时期,国家又陷入乱世,史论不多,儒家建树也很少。

宋代儒家史论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这与宋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长期推行“佑文抑武”的政策分不开。当代学者张立文先生认为:“宋太祖实行‘佑文’政策,宋儒挺起脊梁,从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学权威中解放出来,大破汉唐的‘家法’‘师法’,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掀起了一股具有创新力的、生气勃勃的学术潮流。”^①纵观宋代儒家史论,多借古以鉴今,对儒家纲常伦理与华夷之辨的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主要是因为宋代屡遭四邻少数民族强权的欺凌,长期处在内忧外患之中,身处这种历史背景之下的儒家有着深重的忧患意识与紧迫的危机感,他们治学便多借史论以建言或抒怀,以供统治者鉴戒。单北宋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史论,就达百余篇之多。欧阳修与宋祁合修的《新唐史》,独撰的《新五代史》,其中史论总结了唐至五代的历史

^① 张立文:《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经验与教训，目的也主要是彰显儒家之道。大量论评历史的专著也相继问世，最典型的如范祖禹的《唐鉴》，后世以为他“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①。另外，孙甫的《唐史论断》、吕夏卿的《唐书直笔》、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焘的《六朝通鉴博议》等一系列著作，均以史为鉴，且都颇负盛名。

胡寅生长于南北宋之交的一个学术思想深厚的家庭，其父胡安国是著名的经学大家，专治春秋学，胡安国积三十年之久终于写成了《春秋传》，以儒家义理加以品评，为统治者提供治国安邦的政治思想，其著作一直被后世所推崇。他的弟弟胡宏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胡宏一方面建构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写成《知言》一书，另一方面也对历史加以考证，写成著名的历史著作《皇王大纪》。这本书阐述了他对自三皇五帝开天辟地至周平王之时的历史评价，基本上弥补了其父《春秋传》所记载的周朝历史之前的基本情况。胡寅的《致堂读史管见》正是紧接着其父《春秋传》所载时代而写，并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依据，展开了从周威烈王至后周世宗时期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品评议论。

胡寅论史除了家学渊源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时代的逼迫，他生活在1098—1156年间，正是南宋王朝初步建立的时代，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怎样才能摆脱金辽夷狄的威胁，早日实现国家统一；如何才能结束动荡不安的社会状态，早日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的稳定局面，是当时学者与士大夫共同努力的目标。胡寅希望从历史演绎的过程中抽取出有益的治国安邦的思想，为当世统治者所借鉴吸取，以改变残酷、混乱的现实。

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安国对待历史的态度，更多的是从历史政治哲学的高度来阐发其对现实社会政治的看法，而不是简单地叙述过去的历史事实和政治事件。他将史学引入现实政治的批判，对社会历史和现实政治加以哲学的玄思，从而使儒家哲学的思考获得坚实的历史支撑，这就是他作为一个传统儒家学者应有的治学方法。胡寅《致堂读史管见》也是沿着其父这一治学方向继续前进的。当然，像胡安国、胡寅父子这

^①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五，中华书局1999年版。

样具有明确政治主张的儒家学者，对历史的考究与验证也是非常严谨的，不能随心所欲凭空捏造，或者歪曲历史事实。只有坚守这样的学术态度，才能使其哲学思考不至于流为玄想或空想，而是可以落实于现实人类社会政治生活进程当中，能对人类未来历史存在与演变趋势提供指引与借鉴。在这方面，胡安国、胡寅父子确实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南宋理学与史学相融的学思路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胡寅的《致堂读史管见》是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基础的，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就是以资治为目的，为帝王提供经邦治国的历史鉴戒，但司马光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的身份来编著《资治通鉴》，自然重历史事实的承载与考证，而不重对历史事件加以义理的发挥，也不敢轻易对历史人物加以主观色彩很浓的品评与价值判断。胡寅撰《致堂读史管见》则没有司马光这样的局限，他虽然也依据《资治通鉴》的历史叙述，但是其根本目的并不是重做一部简要的历史，而是希望通过对浩瀚的《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历史事件的选择和评述，来宣扬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因此，在胡寅看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事虽备而立议少为，诚需尚论品评”^①。胡寅认为“事备”是司马光的长项，而“品评”则是胡寅自己所著《致堂读史管见》的特点。作为一个坚决抗金复仇以光复北方的士大夫兼儒家学者，胡寅对现实忧心如焚，这种心理状态在他的史学著作中，自然表现出来。因此，《致堂读史管见》就其议论而言是宏伟严正，尤拳拳寓讽谏之意。

北宋和南宋时期，理学家们通常都是反对王安石变法，连带着也自然反对王安石所创立的“新学”，对其所新创的“三经新义”更是痛加诋毁。王安石的新学注重社会的变革，反对因循守旧，希望仿照周礼的制度创新精神改造现实，对于传统春秋学则不加理会。于是，因感叹王安石变法以来，先圣亲手笔削之书遭受禁绝，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夷变夏，胡安国遂专治《春秋》，揭示《春秋》“微言大义”以拨乱反正。胡安国以为，《春秋》本是一部以历史

^① 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序》，宛委别藏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全书都用此版本。
附注：本论文还参校了湖南图书馆藏的明代张溥校定本和国家图书馆藏中华再造善本（以宋衡阳郡斋残本八卷配元刻本），径改不注。

来见证国家兴衰存亡之道的著作，赵宋之祸，靖康之耻，正是因为“乱伦灭理，丧失治国之义”而造成的。他治《春秋》就是要借此来针砭时政，借《春秋》以寓意。于是他决意潜心治学，备征先儒所论，通过标示其义而定天下之正邪，为百王行政之法。他对于《春秋》所载事实，进一步笔削不已，议论多出于己度，故难免使历史意义颇伤于深刻。胡寅因感时伤世，期待中兴，秉承其父家学传统和精神专治《资治通鉴》，其风格有过之而无不及。《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九《史部·史评类存目》中载：“寅作是书，因其父说，弥用严苛。大抵其论人也，人人责以孔、颜、思、孟。其论事也，事事绳以虞、夏、商、周。名为存天理，遏人欲、崇王道、贱霸功，而不近人情，不揆事势，卒至于窒碍而难行。王应麟《通鉴答问》谓：‘但就一事诋斥，不究其事之始终’，诚笃论也。又多假借端，自申己说，凡所论是非，往往枝蔓于本事之外。”^①虽然如此，但从历史哲学角度而言，如果思想家仅仅局限于历史陈迹本身的考究验证而不能阐发历史的意义，揭示人类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确立人类历史评判的价值标准，也是不足以称道的。所以，对于胡寅的史论不能简单地根据其是否符合客观历史事实来予以褒贬。

胡寅在历史评论过程中，继承了其父胡安国品评历史的渊源，与儒家史论传承相契合，全面展现了他作为儒家学者在史论上崇理尚经的基本特色。在其著作中，他自觉以北宋理学家所开创的宇宙本体论为世界观，对佛学、道学、玄学等与儒家相对立的学说予以批判，表现出鲜明的理学精神。在华夷之辨的问题上，他继承了儒家自《春秋》以来的一贯思想，有着强烈地维护华夏民族文明正统的思想与情感倾向，因而在对历史史料评论的选取上，有其崇儒之正的根本旨趣。他在《致堂读史管见》中选取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相关历史事件与人物，自周威烈王开始至于五代，上下一千余载，累言四十余万。在《致堂读史管见》中，并不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上所载历史事实都详加论述，胡寅自有其严格选择史料品评的标准。他所选取品评议论的历史材料，主要是在反映君臣之义、华夷之分、君子小人之别、天理人欲之辨

^① 永瑤、纪昀等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九，中华书局1981年版。

等史料上,对此论述尤其详尽,并以儒家所坚信的义理与正统观念来作为褒贬历史的标准。他特别强调明理以为经,纪事以为史,史为案,经为断的经史之别,主张用经义来论断历史。因坚定的儒家立场,他本着先秦崇尚“天德”的历史观,结合宋代理学思想的发展,形成了以“天理”为本位的道德史观。这种历史观以分析批判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形式对“天理”加以澄明显现。同时,他也意识到现实时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需要对现实具体制度加以损益,以推动历史的发展。但他始终存在着对三代封建、井田制度的向往与追求,渴望通过《春秋》大义的伦理标准引领历史,改造现实,显示出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

胡寅从历史演绎中总结出社会政治思想,把王道、仁政、德治等作为最基本的政治理念,同时又以之作为现实政治追求的最终目标。从儒家仁政立场出发,他展开了对佛道政治、法家政治、王安石新政不遗余力的批判,进一步彰显传统儒家理想的政治制度模式,即重视统治者自我道德修养与重视客观礼制规范相辅相成、相融相洽的德治模式。

胡寅史论的经世意义,主要是对南宋“国是”产生了积极影响。靖康之乱后的南宋政权,同样表现出具有朋党政治的色彩,士大夫围绕和战问题展开对国家命运的争论,在学术领域则表现为意识形态中的正邪、是非之争,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政治群体在寻求确立治国之道的政治主张时存在激烈较量。胡寅史论无疑是对主战一派的政治主张进行辩护,提供理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最高统治者倡导的政局走向。此外,胡寅史论的经世意义还表现在为后世治学方向与思想旨趣提供借鉴,使义理化倾向的治学修养、治学方法、治学目的得到了传承。因司马光与朱熹都推崇儒学,都非常重视历史的政治教化作用,而且朱熹与胡寅一样都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予以了深入的研究,并对《资治通鉴》中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有过评论,他们的思想代表了当时儒学反思历史政治的基本范式。胡寅正好介于这两个重要历史人物之间,通过与之比较分析,可知胡寅对司马光的历史政治思想有所发展,对朱熹及其南宋史学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其思想表现出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客观辩证地理解胡寅史论形式阐释的历史政治哲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对于认识宋代儒学的演变及其社会作用,自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第一节 胡寅生平事迹简介

胡寅（1098—1156），字明仲，又字仲虎，又字仲刚，号致堂。建州崇安县（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人。他是两宋之交比较著名的理学思想家，也是一个在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其父胡安国是公认的湖湘学派的创始人物，而他恪守父亲的教诲，传承胡安国的理学思想，特别是在历史政治领域，进一步发扬了胡安国《春秋传》治学的方向和理论旨趣，是湖湘学派中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后人将他与其父胡安国，弟胡宏、胡宁、堂弟胡宪合称“五胡”。

一 生平事迹

湖湘学派是湖湘文化主要的开创者与承担者，这个学派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绍兴元年胡安国父子。胡安国，字康侯，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人，祖籍原本在江南，他一生在官四十余年，但有实际官务的时间不足六年，在湖南实际生活时间也只有八年左右。但胡安国在中国思想史和湖南地域文化建设史上的功绩却是非凡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传播了二程的理学思想，如同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武夷学案序》中指出的那样：“南渡昌明洛学之功，文定几侔于龟山。”^①而且他能集杨时之学大成，如全祖望所说：“私淑洛学而集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②这样的成就一方面取决于胡安国的思想能力，另一方面决定于胡安国不懈的努力。第二，他的努力与学识在湖南刮起一股清新的思想学术之风，形成了崇尚理学的学术氛围。他是朝中有名的儒臣，行止一以道义为准则，从不屈曲于权贵，忠君爱民，亲贤远佞，教子有方，而且身体力行，为改变湖南固有封闭滞锢的风气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绍兴元年，胡安国带着妻室儿女离别湖北荆门，来到湘潭碧泉结庐

^①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武夷学案序》卷三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9页。

^② 同上。

定居，开办书院讲学。其子胡宏《有本亭记》中记载：“绍兴庚戌岁，先君子自荆郢趋吴越，遇腹心之疾，不至而返。徜徉游行，遂至湖南，横涉清流，顾而叹曰‘此非沧浪之水乎？何其清之甚也！原可寻而濯我缨乎？’则命门弟子问津于居人，于是傍西山之阴逶迤而下，不及百步，苍然群木下，翠绿澄净，藻荇交映，俗以其色，故号为碧泉。”^①胡安国师承“二程”理学，以程颐之友朱长文和颍川靳裁之为师，深得靳裁之器重。他精研《春秋》经传，以之阐发微言大义，开启了湖湘学的先河。其子胡寅、胡宏、胡宁等秉承父教，潜心向道，大倡其学，逐渐发展成为影响深远的湖湘学派。明全祖望认为：“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胡宏）之上，其所做《知言》，卒开湖湘之学统。”^②随后胡宏弟子张栻继承湖湘学宗旨，在岳麓书院讲学，把湖湘学发扬光大，推向顶峰。现在有学者认为：“在岳麓书院奠定了理学阵营中颇具特色的湖湘学派规模，更对湖湘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历史证实，张栻是岳麓学院值得纪念的重要历史人物。”^③因此，湖湘学秉承河南二程之学，并独具风格，为宋明理学发展史中重要的一支。

根据胡寅自述身世及相关史料记载，他很小就受家庭环境影响，有着传奇色彩的经历：“臣闽人也。闽之俗，地狭人稠，计产养子。臣祖母悯臣之必不生也，委臣父收养之。臣父其年时二十有五，方事婚娶，岂有无子之虑？而必至收养堂兄已弃之子者，缘臣祖母知书好善，告诫之初，于是抚怜鞠育，以为元嗣。凡幼时疾病粥药之勤，长后教训维持之备，义方恩爱，老而弥笃。最后感疾，付臣主祭。于臣大恩，本末如此。”^④胡寅因为出生在福建地狭人稠穷困偏僻的地方，生计艰难，一般家庭很难养活众多子女，因此胡寅降生后面临着被父母抛弃的生死大难。胡寅在出生之初就几乎命悬一线，经祖母怜惜授意，被叔父胡安国收养，认作长子。胡安国夫妇对其并没有偏见，视为己出，疼爱有加，培养教育之功更是不遗余力，终使其成为南宋栋梁之才。因此，胡寅与

① 胡宏：《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3页。

②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五峰学案》卷四十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69页。

③ 陈嘉谷：《岳麓书院名人传》，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④ 胡寅：《崇正辩·斐然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93年版。

胡安国虽不是亲生父子关系，却胜过亲生父子。胡安国对胡寅有再生之德，养育之恩，因而胡寅受胡安国影响至深。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为人从政，日后他都能谨遵其父胡安国教诲，是当时儒家学者当中少有的言行一致、始终不渝之人。

关于胡安国收养胡寅的记载，另据《宋史·胡安国传》说：“寅，安国弟（按‘弟’应作‘兄’）之子也。寅将生，弟妇（按‘弟妇’应作‘嫂’）以多男不欲举。安国妻（按此处应作‘安国母’才与胡寅自述身世相符合）梦大鱼跃盆水中，急取而子之。”^①对于这个说法的记载，还出现在周密《齐东野语》一书中，内容大致相同，都说明了胡寅并非胡安国亲生，是抱养不是过继。因为胡安国抱养胡寅之时，尚只有二十五岁，并不存在过继承嗣的问题。对于这段渊源，在他日后步入政坛时，面对风起云涌的党争，曾遭受主和派政敌——秦桧帮凶右正言章厦许多恶意的攻击，非议他不肯为亲母持服，有不孝之大罪等。胡寅不得不为此进行辩解：“缘过房入继与收养弃遗，恩意轻重不侔故耳。过房入继，礼之正也，则当为本生行心丧解官。收养弃遗，则本生之恩已绝，而所养之恩特厚，虽不为本生服可也。”^②这里主要说明他以前不知自己身世，不为本生父母服丧去官的理由，与政敌攻击他不孝于本生实不相然。而且后来经过朱熹岳父刘勉之来书相告，使胡寅终于明白其中曲折缘故，自此之后他数次归省其生母，恪尽相应的孝义礼节，逐渐使非议他的人不再纠结此事。

胡寅年轻时即受二程博大精深思想的吸引，坚定了儒学治学的方向，反对王安石父子所倡导的新学。他自述自己十六七岁时治学的情况说：“某年十六七，见先君书案上有《河南语录》，上蔡谢公、龟山杨公《论语解》。间窃窥之，乃异乎塾之业。一日，请诸塾师，曰：‘河南杨、谢所说，与王氏父子谁贤？’塾师曰：‘彼不利于应科举。尔将趋舍选，则当遵王氏。’于时某未能树立，而辄萌好恶矣。”^③王安石新学是当时科举考试的标准学说，当时大多数学子想要通过科举考试获取

① 脱脱等：《宋史》卷四三五。

② 胡寅：《崇正辩·斐然集》卷十七《寄秦丞相书》，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③ 胡寅：《崇正辩·斐然集》卷十九。

功名，需要钻研、熟读王安石新学，而胡寅却不为所动。他在此时虽然没有树立弘扬二程理学思想的志向，但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宣和三年（1121），胡寅考中了进士甲科，名列第十。当时胡寅并未曾议婚，因鄙视当时公卿鲜廉寡耻因循苟且，拒绝娶中书侍郎张邦昌之女。后来在胡安国的主持之下，娶张胥之女张季兰为妻。张胥与杨时、陈瓘是亲友，两人都是二程理学的信从者。婚后胡寅与张季兰情投意合，相濡以沫度过许多艰难岁月。宣和七年（1125），胡寅任西京国子监教授，此时正处在北宋内忧外困最危急时刻，京东、河北饥民纷起反抗，又传金将入侵。就在这一年，宋徽宗禅位给太子赵桓，是为钦宗，改明年为靖康元年。靖康初（1126），因御史大夫何栗的荐举，胡寅迁秘书省校书郎。当时著名学者杨时在朝为祭酒，胡寅得以从杨时受学，从此比较系统而全面地接触二程理学思想。

在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胡寅正是而立之年，正逢北宋灭亡南宋建立的非常时期，他亲身经历了亡国之痛，有着强烈的山河破碎的激愤之情与屈辱之感。建炎元年三月，金人商议在金陵（今南京市）建立异姓王朝以汉治汉的政策，胡寅坚持赵宋正统，即与张浚、赵鼎逃出太学中，不书议立张邦昌为帝的奏状。当金人扶立张邦昌为帝，建立伪楚国号，他即弃官归家，因此受伪楚言官弹劾降官一级，遂隐居武夷读书讲学。建炎三年七月（1129），宋高宗改杭州为临安府，以张浚宣抚川、陕。因金人继续南侵，宋高宗诏议移跸之所。胡寅当时经张浚荐举，复任驾部郎官，迁起居郎。对宋高宗移跸之所这一做法，胡寅极为不满，他于九月二十一日上《上皇帝万言书》，另附有《进万言札子》。他在《上皇帝万言书》中慷慨陈词，书拨乱之计，认为高宗应当出师河北，纠集义师，北向迎请二帝，而不宜亟居尊位，安逸享乐。此书可能并没有被宋高宗看到，因当时宰相吕颐浩认为其言辞过于激切，有损圣颜，故让他奉祠，离开朝廷，除直龙图阁学士，主管江州太平观。建炎四年（1130），胡寅寓居湘潭，感悲惨时世，抒抑郁愤激之情，写了《原乱赋》，叙述了宋徽宗致乱缘由，寄希望于宋高宗发愤图强以报仇雪耻，实现中兴赵宋王朝的远大宏图。这篇赋与屈原《离骚》相似，是体现胡寅爱国之情报国之志的壮烈篇章。但宋高宗赵构却并没有这种雄心壮志，只想偏居南方一隅。他采纳了从金营逃回来的秦桧“如欲